

【学界往事】

□丁东

薪尽火传话燕京

61年前,北京就有一所已经跻身世界一流行列的大学被肢解了,至今仍无再生的机会,这就是燕京大学。



进入新千年以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呼声不绝于耳,对此,国人的愿望不可谓不强烈,财政投入不可谓不充裕,管理部门也不可谓无措施,但与目标的距离却未见拉近。然而61年前,北京就有一所已经跻身世界一流行列的大学被肢解了,至今仍无再生的机会,这就是燕京大学。

燕京大学前身是始建于清末的北平汇文大学、华北协和女子大学、通州协和大学等美英教会学校,后三所学校合并,司徒雷登出任校长。他1919年上任,一面在市区的盔甲厂办学,一面到北平四郊踏勘新校址,最后从陕西督军陈树藩手中购得

睿王园,十赴美国募捐,聘请建筑名家设计,建成了以未名湖为中心、中国园林和西方现代设施有机结合的燕园。司徒雷登主政期间,对中外教授在待遇上一视同仁,只要学问突出,不论观点流派,均重金礼聘,一时名家云集:外籍教师有洪业、斯诺、赖普吾、高厚德、班威廉、谢迪克、林迈可等,中国教师有胡适、吴宓、闻一多、冯友兰、许地山、熊佛西、陆志韦、郑振铎、吴雷川、周作人、郭绍虞、钱穆、钱玄同、俞平伯、朱自清、顾颉刚、金岳霖、高名凯等。

司徒雷登提出“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校训,校园内崇尚民主自由,学术环

境宽松活跃,学生除必修的专业课程与必修的国文、英文,可以跨系、跨院自由选修课程。图书馆藏书丰富,学生在书海中任意遨游。师生之间,通过各种社团活动,融为一体,亲密无间,颇有精神凝聚力。上世纪20年代末,燕京大学就在国际上崭露头角,与世界知名学府建立了交换教授和学生的制度。还取得霍尔基金会资助,与哈佛大学合作,成立哈佛燕京学社,为中美学术交流,选派留学生,提供资助与奖学金,熔中西文化于一炉。燕京大学规模不大,三十三年间的毕业生不足万人,却涌现了黄昆、黄华、冰心、吴阶平、陈翰伯、萧乾、李慎之、韩叙、费孝通、侯仁之、朱启平、龚澎、严东生、沈元、谭文瑞、孙道临、周汝昌、蒋彦永等大批各界知名人士,光两院院士就有五十多位。

抗日战争期间,北平沦陷,燕大师生坚持抗日。1941年,日军逮捕了司徒雷登及三十余位燕京大学师生,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司徒雷登才重获自由。在此期间,燕京大学部分师生流亡大后方,于1942年在成都复校。抗战胜利后,燕京大学率先在北平复校。1946年,司徒雷登出任美国驻华大使,校长由陆志韦接任,他们对在野的中共均持友好态度,参

加革命的燕大学生更不胜枚举。共产党兵临北平城下时,毛泽东曾通知部队注意保护清华、燕京及名胜古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燕京大学于1951年改为公立大学,任命陆志韦为校长。毛泽东亦题写校名。但好景不长,当时朝鲜战争已经爆发,中美两国势同水火,燕京大学处境尴尬。在思想改造运动中,陆志韦、张东荪、赵紫宸成为重点对象。当时国家对苏联一边倒,在高等教育领域按苏联模式实行院系调整,作为综合性大学的燕京,在1952年被一分为八,并入北大、清华、师大、民族大学、政法学院、财经学院、音乐学院和中央劳动干校,校园则被北京大学接管。从此,燕京大学在中国大地上消逝。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大学一度中兴,黄华、雷洁琼、费孝通、吴阶平等燕京校友先后走上了国家领导岗位,唤起校友们让母校起死回生的心愿。但终因当时尚未告别对教会学校的认识误区,未能如愿。司徒雷登把骨灰安葬在未名湖畔的遗愿也没能实现。直到前几年,杭州市把司徒雷登故居列为文物保护单位,骨灰才得以在当地安葬。

(本文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中文系人才济济,尤其是文艺人才,绝对有专业水平,也各有特点,限于篇幅,我无法挨个说,就挑几个最顶尖的。

付立新,男高音,一亮嗓子,有李双江的那个范儿。好像是入学不久,付立新在系里组织的一次文艺晚会上首次亮相,技惊四座,同学们都认为他太有才了,也太屈才了,应该去中央音乐学院啊。付立新可没有这么势利,他知道金子在啥地方都是能够闪光的,他的歌声为我们78级挣了不少好口彩。全校演出,有艺术系参加,那都是专业人士,但付立新不输这些人,赢得的掌声让艺术系的头牌歌手心怀疑妒。付立新热爱歌唱,这些热闹的场所是他最向往的地方,可有一回他居然不能参加演出。那次是因为运动会上付立新扔手榴弹把手给摔折了,住院治疗,恰好学校有文艺晚会,大腕儿们都粉墨登场,唯独付立新躺在病床上,辗转反侧。据他自己后来说,那天晚上他手缠着绷带,跑出医院,在临近学校的地方,听到歌声袅袅传来,真是心如刀割。

毕业多少年后,我去潍坊座谈什么投资项目,付立新来看我,知道他在老干部局安分守己。再后来青州同学聚会,又一次听到付立新

【曲师杂忆之二】

文艺人才

□荣剑

嘹亮的歌声,歌技已是炉火纯青。写下这些文字的最后意思是,我建议付立新同学参加央视星光大道节目,在全国人民面前给中文系78级长长脸。

张惠杰,男中音,歌声如他的长相,浑厚踏实,从他发声的样子看,好像受过专业训练。因为有了付立新,我只好把大张排在第二位,实际情况也是这样。付立新可以压轴,大张只能安排在中间场次了。大张人老实,唱歌也老实,甚至有点呆板,不善用比较夸张的肢体动作来加强唱歌效果。放到现在,都是歌手来舞来,歌手上来先抽筋似的蹦跶一会儿,然后再咏。当然,话又说回来了,老实憨厚的大张如果也这么唱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大张后来考上南开大学的研究生,再后来又考上北京大学的博士生,春风得意。他来人大看我,说起他在南开唱歌时的情景眉飞色舞,那真是明星的架势啊,好像粉丝也不少。但到了北大,风水又转回去了,主动报名参加北大艺术团,一亮嗓子还没唱几句,居然就被刷了下来,真是郁闷,从此感到北大的水太深了。大张后来去了美国,刚去时给我来过一信,在那里如鱼得水,但没有提到是否找到了新的粉丝。现在音信全无,真是想念他。

商敬工,女高音,不知是唱的民族唱法还是西洋唱法,可能两个法都有,那真是唱得好,教文艺理论的杨老师尤其推崇备至,他在小商的歌声中听到了夜莺的声音。杨老师富有诗人气质,说话抑扬顿挫,激情四射,他对小商歌唱艺术的总结,是高屋建瓴。小商人比较含蓄,有风度,没有像付立新和大张那样,有点急吼吼露一手的好劲头,轮到上台时,貌不惊人,举手投足,有大家风范。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小商后来在政治上成长的基因其实早已有之。小商现在已经是主席了,市科协主席,做领导几十年了,见了同学没有丝毫架子,平易近人得很。那次来北京视察,和北京同学聚会,席间谈起商主席的歌唱艺术,商主席和我们都很激动,在那遥远的歌声里有我们美好的回忆啊。

78级不光有唱歌的人才,还有舞蹈家余钦伟,别看他现在这么臃肿,打死都不敢相信他还能跳舞,但那时他可是身轻如燕,跳的那个惟一的舞好像就叫“海燕”。记得在舞台上(有没有音乐忘了),余钦伟模仿着海燕飞翔的各种动作,在暴风雨中不断地搏击着,抗争着,最后以一个优美的造型定格在舞台中央,让人回味无穷。对余钦伟的这段光辉历史,也有人以为不然,外文系的一个女生在许多年后的一次聚会时,用“太逗了”来评价小余的舞蹈,说现在想起来还直乐。这有点不严肃,也不宽容,就是因为逗人才让人记住了,能在多少年过去后让人记住一点事,不容易。

最后要说到著名主持人李盈同学。李盈是央视名记,经常亮相新闻联播,只要一看到她出镜头,我就忙不迭地对周围人说,那是我大学同学,特自豪。李盈在当大学时,是学院重大庆典的一号主持人,说话字正腔圆,声情并茂,绝对有明星的范儿,如果她出道早些,哪还有倪萍的份儿?人漂亮不是错,可苦了那些痴情汉,那时,多少男生暗恋李盈,公开跳将出来竞争的也有几个,幸亏还有君子风度,没有酿出流血事件。李盈坐在前排,邻座是老共产党员张爱仁同学,这让其他同学都羡慕不已,私下里都说老张艳福不浅。你说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的美人儿天天坐在身边,立场再坚定有时也不免会心猿意马吧。老张早上起来头件事,就是涂香脂子刮胡子,把下巴刮得青亮,看上去是年轻了许多。说到这里,还是要佩服李盈同学的自控力,上学四年,没有绯闻,其实内心早已有主。她和家明的结合,不出同学意外,都是才子佳人配。

(本文作者为独立学者,曲阜师范大学中文系1978级学生)

【人性观察】

□刘亚伟

那些干坏事的好人

这个实验告诉我们,在某种制度环境里,一个人的残酷往往与个性无关,而与服从的权力、服从的组织机构密切相关。



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心理学教授米尔格伦搞了个关于服从机制的心理实验,这个实验后来被称作“艾克曼实验”。参与者被告知,这是一项关于“体罚对于学习行为的效用”的实验,并被告知他被随机选择担任“老师”,以教导隔壁房间的另一位参与者“学生”——“学生”事实上是由实验人员假冒的。每个参与者都拿到了一张“答案卷”。实验小组告诉他,隔壁被选择担任“学生”的参与者也拿到了一张“题目卷”。实验中“老师”和“学生”分处不同房间,互相看不到对方,但能听得到声音。

实验人员告诉扮演“老师”的参与者:隔壁坐在椅子上的“学生”,双手被绑在椅子上,手腕连接着电极,他必须跟着老师,按照试卷上的内容学习、回答问题,如果错了,“老师”就要对他施以电击。电击的强度是可以逐步升级的,“老师”手中掌握着从15伏特到450伏特的电击控制装置,从最微弱到最强烈的电击都有明显标志。“老师”不停给

题,只要“学生”回答不出或回答出错,马上予以电击;根据“学生”错误次数的增加,“老师”可增强电击。

实验中,电击强度达到75伏特时,受到电击的“学生”开始呻吟;至150伏特时,“学生”提出终止学习的要求;至285伏特,“学生”的反应是极度痛苦的叫喊;而升到450伏特就死去活来了。但在“学生”哀求停止实验时,“老师”并不停手,因为“有约在先”——他从实验者那里得到的指令就是不要因为学生的原因而中断实验,不管发生什么都要一如既往地继续进行下去。若是参与者表示想要停止实验时,实验人员就以“权威话语”下达指示:“这个实验需要你继续进行,请继续”、“继续进行是必要的”、“责任由我来负,请继续”。如果经过反复敦促,参与者仍然希望停止,那实验便会停止。否则,实验将继续进行,直到参与者施加的惩罚电流提升至最大的450伏特并持续三次后,实验才会停止。

其实,在这个实验中,并

没有真正的电击存在!“学生”都是知情者,他或她只是发出痛苦的声音而已。“学生”只是配角,真正被“实验”的主角是负责电击的“老师”们。实验的目的,是观察一个人如何接受和服从一项有悖良心的指令。

在进行实验之前,米尔格伦曾和他的心理学家同事们做了预测实验结果的测验,他们全都认为很可能只有1%到10%的参加者会狠下心来继续惩罚直到最大伏特数。

然而,实验结果令人失望:没有一位“老师”拒绝对学生进行不人道的电击,而且在电击过程中,他们越来越变得残忍:对于学生开始出现的痛苦,他们表示蔑视;对于学生苦苦哀求停止实验,他们充耳不闻;当学生发出尖锐的喊叫时,他们甚至因为“学习过程”被干扰而愤怒倍增,毫不客气地把手中的电击强度再次升高!第一次实验的40名参与者中,有27人把电压升到顶点——450伏特!他们的想法是:那家伙脑子笨、傻瓜,只好给他增大刺激!

这些“老师”扮演者并不是生性残忍,他们只不过是一些普普通通的工人、职员、技术人员。为了保证实验结论的普遍有效性,米尔格伦对实验者采取了“海招”的方式。参与者年龄从20岁至50岁不等,从小学毕业至博士学位各种教育背景都有。事后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你让我这么做,我有什么错?”

米尔格伦后来将这项实验做了调整。他在房间加装

窗户,让施加电击者看到受害者因为痛苦一边扭动身躯一边“尖叫”。尽管如此,80%的受试者依然把电击转到“强”,65%的人甚至转到“极为危险”。

实验的秘诀在于这样一句话:“没事儿,你们不用承担任何责任,你们只管继续做。”这意味着受试者头脑里建立了这样一个概念:我们只是在服从,而不是在作恶。

通常情况下,人们不敢作恶的原因之一,是不愿承担责任。现在,既然有权威人士发话,作恶者就有理由认为他们可以把责任都推卸到发话者身上。

心理学家米尔格伦从中得出的结论是:即便那些对于他人没有任何敌意的人,也会承担非常可怕的破坏性工作。只需要一个小小的指令,一个人就可以摆脱自身责任的重负而进入一个无道德限制的非人性状态。而明明知道自己的破坏行为可能产生不良影响,已经感到所做的事情与自己的基本道德规范相抵触,能够选择抵抗权威的人是极少数。

这个实验告诉我们,在某种制度环境里,一个人的残酷往往与个性无关,而与服从的权力、服从的组织机构密切相关。这就解释了人们通常所说的“好人为什么会干坏事”这句话——邪恶之事并非都是恶人做出来的;即使你自认为是个好人,只要你一味服从从而不思考,你很可能作恶,甚至作大恶。

(本文作者为作家、独立学者)